

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政治语言“三维体认”机制探析

肖鸿飞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共青城 330000)

[摘要]政治语言由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构成。政治语言的翻译需从语言层面、语境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索。现当代政治语言翻译不应只关注翻译结果,同时还应强调政治语言翻译的过程化学习,即政治语言内涵、政治语境和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与探究。认知翻译学以翻译的体认性、互动性和创造性为核心思想,重点关注译者的认知过程。剖析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政治语言的语言维、语境维和文化维的“三维体认”,构建该视角下的政治语言翻译模型,对该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翻译“体认观”;政治语言翻译;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肖鸿飞(1990—),女,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省级重点课题“新时代‘三进工作’背景下的浸润式翻译课程思政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XJG-22-32-2)。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6045>

[中图分类号] H059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孙玉华,2015),前者可视为后者文字载体,后者从语言表达形式上比前者更为丰富。刘宏与刘明徽对2000年—2021年间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其分析发现,国内政治话语翻译实践存在语言层研究和超语言层研究并存的情形,其中语言层包括从词汇、语篇、符号、语用、修辞等角度来分析政治语言的语言特征和翻译规律;而超语言层则关注政治话语翻译与国家形象构建、政治话语翻译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等方面。通过观察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对象发现,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的政治隐喻翻译、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及翻译语境作用、政治话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等修辞表达翻译、有关于社会和政治文化历史等政治语篇语境特征、政治意象翻译转换、政治内涵翻译对等的研究占据研究的主要部分。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则包括政治术语、新词、文化负载词的词汇语义翻译,四字成语、熟语等修辞语义翻译以及政治隐喻翻译。政治文本翻译策略研究方面,李志丹总结了黄友义于2004年提出的“外宣翻译三原则”,杨明星于2008年提出的“政治等效”理念;冯志杰于2010年提出的“内涵再现、逻辑严密、哲学风范”三标准;卢卫中总结了政治排比

翻译的一般方法:保留、替换、调整、舍弃和添加等。根据过往政治话语、术语、排比、修辞等的翻译研究看,政治话语、文本翻译的早期研究重术语(语言层)分析、语篇(语境)分析和内涵(文化)分析;传统译论基础上的分析多,新理论开拓的少。在此背景下,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政治语言翻译思路的提出,恰逢其时。

认知翻译学是一门以译者认知为核心研究对象,向外辐射诸多翻译过程问题的学科。在认知翻译学框架下,翻译是体验的、互动的、创造的,主观的也是客观的;翻译过程要兼顾作者、文本和读者,倡导和谐翻译。Ricardo Muñoz Martín正式提出了“Cognitive Translatology”,即“认知翻译学”这一术语,国内四川外国语学者王寅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王寅(2005)提出语言是理性的映像,非先验之物,认可了人类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主体作用,认同了语言的认知观。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王寅又提出心智的体验性,认为人类只有在对外部世界的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和感受后,才能产生思维与理性并形成意义。人类是社会动物,因而决定了人类体验及人类语言(特别是隐喻)的社会性和人文性(人本主义),而源源不断的新的体验赋予了语言以创造性。在语言体验和心智体验基础上,王寅进一步提

出了翻译的体认观。基于认知翻译学的“体认”意识和政治语言翻译的语言重点、语篇重点和文化重点,为政治语言翻译打造语言、语境和文化的三维体认观。

一、政治语言翻译中的语言体认观

所谓语言体认,应基于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如字、词、句、语篇等。人们普遍认可需要在语篇、语境约束下来认识意义,但却不能否认字词可能包含的原型含义。因此,在学习政治语言翻译时需要拥有字词体验。政治语言学习中的一大难点在于政治术语和政治概念的习得。政治术语是对政党和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所作的特定形式的语符表征。政治概念和政治术语略有不同,政治概念指的是“党和政府在内政外交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独特性和政治特质性的词汇”。无论“术语”还是“概念”,都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术语与概念的“历史性”意味着相同的语言表征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与外延可能发生变化。尽管科技发展与专业语料库建设为术语翻译提供了便利,但也带来风险:翻译学习者可能过度依赖技术,忽视术语背后的语义演变,从而转向“对照翻译”。以“社会主要矛盾”(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为例,十九大将其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改革开放初期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前者体现新时代特征,后者则唤起八九十年代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集体记忆。对于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一代而言,缺乏这种历时体验,使得翻译时更需加注时代语境,例如使用“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戎军涛与李艺亭以“知识元”解释概念,认为概念是知识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具备语义完整性并承载特定知识内容。知识元由语义元构成,语义元通过语义键连接,构成知识元内部复杂结构。不同认知主体因语义元与语义键积累不同,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亦有差异。出生时代的不同导致翻译学习者面对新概念时可能缺乏相应的认知映射,难以从工作记忆中提取合适的语言表征。Kroll与Steward(1994)提出的修订层级模型指出,初学者通过母语联结记忆二语词汇,而高水平学习者则通过概念激活双语词汇,对应形成“母语—概念—二语”的三角关系。这一过程与钱钟书“化境论”强调的“词汇概念化”不谋而合,表明政治语言翻译教学应重视二语习得中概念生成的路径,尤其是通过语境与体验

促进词汇与概念的深度联结。

语言层体认除了词汇概念体认还包括修辞体认。修辞能够从美学角度提高文本的内涵和可读性。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姜琳在其博士论文中单辟一章,着重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朝韩译本中修辞手法的翻译,其中包括比喻、排比、反复、对偶、设问和层递辞格。在分析每一种修辞手法的翻译时,姜琳对该种修辞手法的作用进行了述评,如比喻修辞能够将古板的政治语言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排比表现力强,能够强化语言的表达和内在情绪,突出文章思想;而反复修辞格能够帮助表明使用者的立场,引起读者注意力。张威与杨嘉欣通过平行语料库统计数据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主语省略句占全部句子的44.47%,并得出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以动宾结构的连动句、并列句、流水句等句式形成“隐含叙事”的特征,而英美国家政治话语以“主语+谓语”结构为主体的显性叙事为主要特征。当然,并不是所有政治话语和文本都广泛采用各类修辞手法。吴雨纱在分析2014年—2021年主席新年贺词的政治修辞时发现,贺词的辞格的丰富程度逐年递增,从2014年的比喻和排比两者,到2021年新增的拟人、引用(传统诗词、楹联等)和反复,但八年间的贺词中从未出现夸张、反问和设问,这一点与《治国理政》中又略有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人政治讲话需秉持严谨态度和大国风范。而在5G时代,文本的修辞可以通过视觉意象进行加持,这类修辞被称为“政治视觉修辞”。作为文本的政治叙事通过文本分解成词汇和句子,在视觉修辞中替换成线条、色彩、形状甚至搭配上具备强弱的生效,这样能够有效规避文字阅读所产生的枯燥感受并增强对感官的刺激。通过政治视觉修辞中修辞意义产生的机制分析,刘晶提出该类修辞意义的形成并不是由生产者创造,也不是解码者(受众)创造,而是解码者基于编码者制造的文本,依赖经验解读而产生的,因而,视觉修辞内涵的获取,不可偏离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而这三者也相应借鉴至修辞翻译的过程中来,同时也提醒翻译实践者,应灵活使用视觉资源来辅助形成对词汇、概念和修辞的“共同经验”。

二、政治语言翻译中的语境体认观

陈开举将胡壮麟所著《语言学教程》中所提到的七类文本意义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字面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是通过语言学的基本规则所得到的;第二个方面包括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和反射意义,它们脱离了语言外壳,是创作者内心感情和意愿的外现,

是其个人经验和感悟的结晶。而个人经验一方面依托于作者所处的物理环境和即时适应,另一方面更扎根于作者在漫长时间中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体验和感悟,并从中凝聚成写作意图。而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去寻求显性和隐性的语境,构建对应视域,推导作者意图并加以阐释的过程。江怡提出,语境是“一种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江怡认为,人类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无法得出语言意义最终确定的解释,因而阐释是多样的,但语境的“限度”和“范围”就使得意义的相对确定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实现,确保意义获取不会过分偏离核心。虽然词汇的内涵以文本和用法为前提,但语境的加入让意义的确定和说话者在当下使用语言的思想融为了一体。语言的社会意义包含了语言意义和非语言意义,是语境概念的最终目的,并且是最高级、最复杂的意义,排在文本语境、用法语境、意向语境之后。不同语境确定了不同层次的意义,因而译者在翻译时,要以文本的社会语境为指导去寻求最高层级的社会意义。由此可见语境体认的重要意义。然而,上述语境分析重点关注的是所有与翻译有关的客观要素,并没有考虑译者本身的认知要素。基于此,前文所述语境要素被统归于“传统语境”的一部分,它们构成对语言事件参与者认知影响的外在要素,而传统语境的另一部分被归拢于“主体语境”,主要指的是语言活动参与者的心理状态、交际能力和观念。而在认知翻译学视域下,需要构建以译者为核心的认知语境。郑剑委与彭石玉借用了 Lyons 的定义:认知语境是从具体情境中抽象而来,对涉及语言事件各方有影响的,并能参与到话语形式、恰当性和意义决策的所有要素。此外,Sperber 与 Wilson 深度阐释了何为“认知语境”。徐学平解释,该认知语境是一系列可显映的事实构成的集合,而“可显映”表示某一事件能使认知主体形成心理表征;而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其所在的认知环境是所有显映事件或者是假设事件所构成的集合。同时,成功的交际不是在认知主体双方都共有某知识为基础的,而是以事件在主体双方的心理表征上能互为显映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共享知识”是实现成功翻译(交际)的一个认知条件,实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在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身上形成互为显映的心理表征才是实现成功翻译的关键。以实现翻译目标为导向,应如何构建语境?翻译的语境构建与单纯的二语交际(例如对话)语境构建有很大不同,但二语交际的语境构建能够为翻译的语境构建提供指导。双语交际是参与者之间相向沟通,或者

说,是认知主体在已知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交际行为。但是,翻译活动涉及的三方认知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并不是直面沟通。比如,因历史因素、地域因素,译者无法和作者进行直面沟通;且因译者在译本完成前无法直接与读者沟通,因而很大程度上,语境构建变成了两步骤、单方向的预设(图1),那么,认知翻译学视角下语境构建的结果最优化就是使得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认知成果交叉部分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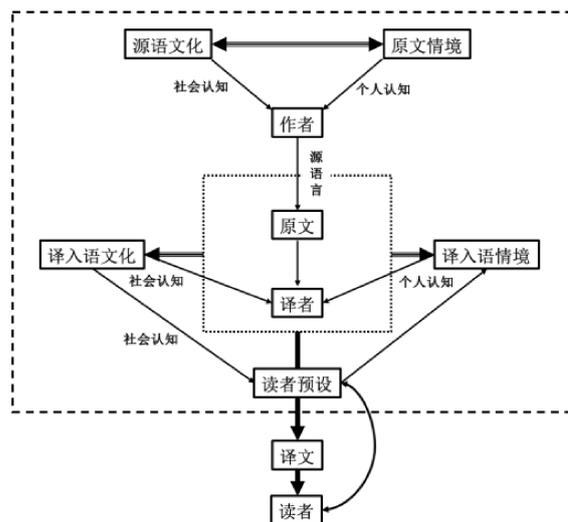


图1 翻译过程中认知语境的构建

若译者翻译是自建其认知语境以实现翻译目标,那么对于翻译实践者和翻译教学而言,获得构建认知语境的能力十分重要,除了遵循认知语境构建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线性排列原则,即强调不同话语顺序给接受者传递不同的信息;就近原则,即话语接受者应以达意为指导,构建话语理解所需要最基本的认知语境,以及类比原则,即读者通过思维中基于过往经验的类比来理解文本,还应加强语义分析能力、对语境的文化、历史的考察以及对知识情景的分析。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频繁提及“斗争”一词。在第二十一章的“努力成为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一节中,习近平主席对中青年干部提出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要求,并强调“我们党历来提倡团结,但团结是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成的,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关于“斗争”一词的翻译,应如何处理?虽然从字面意义上容易联想到“fight”等词汇,但是否可直接采用“fight”仍需谨慎考虑。“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就高度重视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他所总结的“红船精神”包括“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对于伟大斗争的解读,陈锡喜提出了两个层次:哲学层面指的是事物内部各方面互相排斥的绝对性作用;实践层面指的是通过党领导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来解决不同群体乃至阶级的利益矛盾。通过解读发现,“斗争”是哲学的斗争,是共产主义的斗争,它需要特殊的政治语境得以成立。而依据新世纪英汉大字典中对“fight”的解释,发现该词更倾向于描述“战争”“搏击”“打架”等。回到文本本身,“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两个斗争是否有区别?文旭与肖开荣在其所著《认知翻译学》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指导下的认知语境概念视阈下,人们倾向于关注最关联的现象,构建最关联的表征,而关联性需要通过语境效应和加工力实现。简单来说,语境效应即文本所能提供的语篇背景信息,信息越丰富,就越能够激发受众的语境联想,达到说话者(作者)的说话(写作)目的。基于此,可以发现“思想斗争”中能激发语境联系的词为“思想”。通过以上语境分析能够帮助译者得出翻译的基本思路,那么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将称为寻找语境搭配的描述,而这也是译者认知加工力发挥的最主要场所。

三、政治语言翻译中的文化体认观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但从认知角度看,译者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参与者,也受到文化对其认知活动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制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来自译者所处的母语文化,另一方面则来自目的语文化,甚至个体对文化的认知差异亦会影响其翻译策略。例如,师琳指出,翻译多发生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她以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规避直译“红”字为例,说明其采用归化策略以避免误读,这在当时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具有合理性。但仅以文化强弱解释翻译策略并不充分,“读者接受”等视角同样可以提供有力解释。尽管如此,文化意识无疑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认知方式,这一过程需结合认知科学进行深入理解。何静区分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认为后者是影响群体成员行为与信念的规范系统,其要素具备特异性与复杂性,是社会认知的基础框架。人类进化出依赖文化的认知机制,大脑如同概率预测系统,根据感官输入与已有知识形成预判,并通过神经活动实现预测误差最小化,从而优化外部世界的认知。因此,文化规则既是认知的先验知识,也作为调节参数影响人的自我预测和社会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受到母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需主动对目的语文化进行判断与调适,从而做出翻译策略的理性选择。

译者在进行不同类别文本的翻译时,会受到相关文化要素的规约。在进行政治语言文本的翻译时,就应相应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如前文所述,译者会受到双语文化要素的影响,而反映在政治文化方面,则表现为对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文化的接纳与调和。高旺总结,国内以及国际上对政治文化的内涵界定有同一性趋向,基本归拢于心理、情感和观念三方面,体现在人们的态度、观念、规范、思想和价值观方面,也体现在人的心理和行为习性(如语言、表情、音调等)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以人民性、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要特征,是多元化的统一,强调“和而不同”。而国际交往中的国际政治文化,则是对人类整体命运、国际社会运作和维系的关切,体现的是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国际政治文化发展形成的是“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谐共生”“公平正义”的原则。国内和国际政治文化内涵均影响译者的认知和行为,甚至于,人们应将从事政治文本翻译的译者看成是显性的政治行为主体,会因对政治活动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不同而具备不同的行为选择(陈华森与李波,2020)。例如,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一表述表现的是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针对潜在的外国侵略者所会采取的坚决态度。在该段表述中,“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和“头破血流”都采用了修辞语言,具备隐喻内涵。而我们能在官媒与外媒两个译本对“头破血流”的译法,能看出政治文化对译者认知的影响机制。

原文: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官方译文:Anyone who attempts to do so will find themselves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a great wall of steel forged by over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外媒译文:Anyone who attempts to do so will face broken heads and bloodshed in front of the iron Great Wall of the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很明显,官方译文采用的是意译的翻译手法,而外媒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手法。而官媒的翻译手法如何体现译者的文化体认?语言和政治文化都属于广义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当中国的译者在阅读到上文中的“头破血流”时,不仅会产生词语字面上所表达意思的画面,但随后,在“政治文本多采用修辞”的意识影响下,主动去剖析该政治文本所表明政治文化中所蕴含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因

此能很快明白,该修辞手法所想要传递出的,是两层意思,第一,是中国人们团结一致对抗外部侵略的决心;第二,侵略中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在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法时,“broken heads and bloodshed”很明显能传递出对抗的决心,但营造出来的画面非常的血腥且具有侵略性,可能会在阅读该英文翻译的外国读者心中留下一个“中国崇尚武力”的印象,违背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准则和亲善形象。因此,在经过一轮对比后,译者会否定不符合其认知语境中的一些结果选项,并选择最终的结果。

由此总结,语境与文化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要素会影响语境要素,而语境要素会丰富文化要素。那么对于译者而言,文化要素和语境要素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译者对文化要素和语境要素的体认,即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联想到了相关文化要素和语境要素、分析了相关要素可能产生的结果、接受这些要素对自我认知和结果选择带来的影响。

四、结论

文章从认知翻译学理论视角下,从语言体认、语境体认和文化体认三个方面对政治语言翻译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分析成果,建立了具备参考意义的翻译模型。认知翻译学注重翻译的认知过程,强调“体验”对认知的影响,因而政治语言翻译的过程也不应忽视语言、语境和文化三方面的经验。语言层面的二语能力,语境层面的主体认知语境,文化层面对主体认知的影响,都是政治语言翻译能力培养需要考虑的问题。认知翻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从理论层面上,应加强认知翻译学与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文章所分析内容更关注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分析过程和决策过程,而如何激发译者的关联联想和词汇联想,即人脑中关于语言策略选择的黑盒子运作,是实现翻译目标的另一关键步骤。实践研究层面应关注认知翻译学的实证研究,即采用诸如有声思维模型等实验方法,通过输入和输出,进一步具象化人的认知翻译过程。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双管齐下,认知翻译学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参考文献:

- [1] 孙玉华,彭文钊,刘宏.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1):1-7.
- [2] 刘宏,李明徽.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文献计量分析:问题、热点与趋势(2000—2021)[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4):1-11,65,145.

- [3] 李志丹.近二十年国内政治翻译研究可视化分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8,33(6):84-88.
- [4] 卢卫中.政治话语排比修辞翻译探析[J].外语电化教学,2022(3):33-38,107.
- [5] Martín R. M.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0, 5(2): 145-162.
- [6] 王寅.再论语言的体验性——认知语言学的语言体验观[J].山东外语教学,2005(2):3-8.
- [7] 潘荣成.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术语译介研究:综述与展望[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22(3):59-62.
- [8] 刘宏伟.政治术语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依赖性——以“中国梦”英译为例[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24(3):1-6,80.
- [9] 陈锡喜,冯冉.理论基础、辩证思维与价值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的三个维度[J].江西社会科学,2022,42(11):5-12,206.
- [10] 戎军涛,李艺亭.语义融合视角下概念知识元生成机理研究[J].图书馆,2023(5):74-81.
- [11] 李黎,倪传斌.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发展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1):16-24.
- [12] 姜琳.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中韩外宣翻译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 [13] 张威,杨嘉欣.中国政治话语“隐舍叙事”的翻译与评价[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3-3(5).
- [14] 吴雨纱.国家主席新年贺词的政治修辞与报道框架分析(2014—2021)[J].新闻知识,2021(8):43-46.
- [15] 刘晶.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维度与阐释框架[J].浙江学刊,2021(1):44-54,2.
- [16] 陈开举.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J].中国社会科学,2023(2):184-203,208.
- [17] 江怡.语境与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8(2):8-14.
- [18] 郑剑委,彭石玉.过程化认知翻译语境模型的构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5):83-88.
- [19] 徐学平.语境研究的认知观[J].山东外语教学,2003(5):49-52.
- [20] 韩力扬,陈红.论预设的认知语境构建功能[J].河北学刊,2010,30(2):242-245.
-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32.
- [22] 陈锡喜.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内涵、外延和战略思维[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9):10-18,108.
- [23] 文旭,肖开荣.认知翻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73.
- [24] 师琳.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学,2011,32(6):109-112.
- [25] 何静.从预测心智理论看社会认知的文化建构[J].浙江学刊,2023(4):171-177.
- [26] 高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

[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5):91-97.

际整合功能[J].探索,2014(4):108-111.

[27]杨庆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

[29]孙有中,等.理解当代中国之汉英翻译教程[M].北

析[J].社会主义研究,2020(3):125-132.

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28]陈华森,李波.和谐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族

Explor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Cognit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Languag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XIAO Hong-f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Gongqingcheng Jiangxi 33000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language consists of political text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needs to be analyzed and explored from the linguistic,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level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anguage transla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translation results but also emphasize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led by political language translation, that is,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connotation, politic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culture.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focuses on the cognition, interaction, and creativity of transl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o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to analyze the “three-dimensional embodiment” of political language from linguistic,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to construct a political language translation model from th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embodied cognition” of translation; political languag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odel